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急躁冒进原因探析

陈 国 清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国清(1951-), 男, 湖北浠水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理论系教授, 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摘 要]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急躁冒进, 并不是由于党的领导层或某位党的负责人的一时冲动, 是当时发展工业与落后的农业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及解决这一矛盾的必然结果, 同时, 理论认识上的片面性, 观察形势上的失误和地方各级领导人大哄大嗡的人为造势, 也是促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要求过急, 工作过粗, 改变过快, 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 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急躁冒进; 根本症结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6-0686-05

一、计划失控及冒进思想日渐高涨的必然

关于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应该说中共中央在思想和理论方面还是有准备的。早在新中国诞生以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中共中央就奠定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指明了引导个体农业向着集体化发展的方向, 认为这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1953年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对为什么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 作了较为透彻的论述。但是, 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计划和方案, 并不确定, 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动中。关于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到底要多长时间, 最开始只有一个模糊的说法, 即相当长的时期。计划用15到20年时间来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到1955年底, 毛泽东提出《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 认为“农业合作化的进度,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 省、市、自治区(除新疆外)一级的指标以要求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户入社为宜, 让下面超过一点, 达到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左右。合作化的高级形式, 争取于一九六〇年基本上完成, 是否可以缩短一年, 争取于一九五九年基本上完成”^[1](第478页)。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则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达到85%左右的农户加入农业合作社。要求合作化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在1957年基本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其余地区, 则要求在1956年, 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100户以上)的高级社, 以作榜样, 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2](第528, 529页)。而事实上呢, 1956年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关于合作化发展问题, 最初中共中央在1953年所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决议中, 曾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 即到1957年, 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争取发展到80万个左右, 入社农户应争取达到农村总户数的20%左右^①。1954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中, 又改为1957年全国计划发展130万个或150万个农业合作社, 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发展到占全国农户的35%左右,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大约在1960年前后), 在全国大多数地区争取实现基本上合作化。而在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 则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于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合作基础较好的地区, 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到1958年全国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3](第529页)。

在农业合作化的时间和速度上频繁变动,不断加码,无形给人们造成这么一种印象,即计划总是落后于实际,要跟上形势,就得超过计划。同时,由于计划的不确定性,也易于造成人们的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当然没有永远一成不变的计划,问题是经常变动,并且一变就很大,这就给不按计划办事、超计划贸然行事开了口子,从某种意义上讲轻率、频繁地改动原来比较切合客观实际的计划给急躁冒进开了方便之门。故此,1955年夏季以后出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热潮,不是偶然的,实质上是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急躁冒进情绪的发展和延续。在1955年夏季以前,中央农村工作部曾针对1952年底和1954年底部分地区不顾客观条件,突击办社的情况进行过两次反冒进,也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使快速发展的步伐减慢了一些。但1955年夏以后就挡不住冒进势头了。因为“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夏季就来了一个反冒进。……例如,一九五二年冬季有一个发展,一九五三年春季就来了一个反冒进;一九五四年冬季有了一个发展,一九五五年春季又来了一个反冒进”^[1](第395页)。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党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分歧,存在着急躁冒进和发展巩固的冲突。前两次的盲目办社被制止,但思想上未彻底解决问题,中央主要负责人又倾向加速发展,加上农业合作化的进展较顺利,在胜利面前,许多人转而赞成掀起一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人关于“发展中巩固,巩固中再发展”的意见当然就遭到了批评。

二、社会改造和技术改革关系上的认识偏差和影响

中共党内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之前,曾就如何改造个体农业经济的具体方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苏联的经验,首先必须使国家工业化,创立新的拖拉机工业,建立新的农业机器制造厂,以便供给集体农民以充足的拖拉机和机器。认为这是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决条件,这种意见比较重视对个体农业改造的物质基础。另一种意见主张,先合作化,后机械化,也就是第一步进行社会改革,第二步再进行技术改革。后来,又具体地把这一方针确定为:在前两个五年计划里先搞社会改革,即搞农业合作化,先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搞农业机械化。比较而言,第二种意见应该更符合中国国情。因为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比较切合我国社会当时主、客观实际。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俄国和中国,尽管都落后,但是,比较起来中国则更落后,苏维埃俄国有一定工业基础,战前沙俄的工业仅次于英、德、法、美、日;而解放初期的中国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1](第506页),自然也就不能为农业机械化提供条件。土地改革以后,如果不“趁热打铁”,不把农民组织起来,那么,必然过不了多久,个体农民又要出现两极分化,到那时再进行农村社会改革,当然不如“趁热打铁”好。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分两步走的方针肯定了我党工业落后,考虑到我国农村现状,因而在当时有利于农业生产,照顾了翻身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但是,两步走的方针也有一定片面性或者说不太准确的地方。首先,把社会改革与技术改革分开搞使人易于产生这样的误解,即先搞合作化,不搞机械化,使人们易于忽视技术改革,热衷于社会改革,忽视生产力发展的技术要求。其次,两步走的具体设计,把10到15年的时间主要用来搞社会改革,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才加大合作化与机械化并举的力度则易于使人产生“相长时间内”我们可以暂不考虑合作化的物质基础。实际上离开了物质基础,集体化是难以继续发挥它的优势。后来的实践证明,的确是很多人只热衷于搞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急于在改变生产关系上做文章,并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由可能变成现实。主张学习苏联经验的同志,强调集体化必须要以机械化为条件,尽管这种意见在农业合作化初期办不到,但他们重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的思想不能说没有其合理性的地方。如果我们当初一五计划期间合作化步伐放慢一点,社会改革与技术改造协调得好一些,边合作化边机械化,逐步以机械化装备农业合作社,可能农业合作化的成果会巩固得好一些。

在1955年夏季以前和其后党内关于实现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巩固与发展的争论,尽管不是以集体化和机械化为焦点,但是,党内当时确有一种急于过渡、急于改变生产关系、忽视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急躁冒进情绪。这种只讲数量只求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不讲质量、忽视巩固提高的思想,应该说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两步走方针的扭曲。本质上反映了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二者关系认识上的片面性,夸大了生产关系变革的作用。这种片面的理解和认识不能不说是合作化运动后期急躁冒进的思想根子。

三、对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和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认识不足

1955年夏季以后,邓子恢同志被错误地指责为“右倾保守”的代表,被说成是在摇两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党

人:走快了,走快了的“小脚女人”,中央农村工作部1955年春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也被否定。党内主要负责人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有的地区已经到来,有的地区即将到来,群众运动已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使各省、市、自治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即开始“一边倒”。一方面纷纷检查上半年各自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一方面积极向中央反映本地区农民如何要求加快合作化的步伐以及对停止发展和解散合作社的切齿痛恨;一致认为几年来农业合作社发展太少,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领导远远落后在群众运动的后头,似乎农民对合作化运动有一种天然的无穷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事实呢?当时下基层调查的同志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却不是这样的。1955年4月农村工作部派下去调查浙江农村情况的同志,从杭州发回北京的报告表明,由于1954年的自然灾害和我们在粮食方面购过了头,统销面过大,浙江农村有些地区“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逞不稳之象”^②。从其它省情况来看,“农民对我们的警告已经不止在言论上说怪话,发牢骚;并且表现在行动上。其积极的如几百人、几千人的集合骚动,在广东、湖北,各省均有发生,最近江苏萧县尚有五千多人骚动,谣言四起。消极的如不务生产、宰牲口、杀猪、杀鸡、不积极积肥以及砍伐树木如果树、桑树等等。”^③这些情况尽管出现在少数省的部分地区,不带普遍性,可是它说明农民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要求个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包括贫农在内都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农民是靠眼睛不靠耳朵,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主要靠眼睛看,不是光靠耳朵听听。”^④邓子恢同志认为:“高高兴兴,双手举起来,甚至哭哭啼啼地要求入社,你就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觉悟高了,这样看会使我们犯错误的,就助长了干部的冒进情绪”^⑤。应该说那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艰巨性的认识是到位的,对农村形势是了解的,指出过高估计农民积极性是急躁冒进的重要原因,是一语中的。那么,五五年夏季以后,为什么农民的合作化积极性一下子又高涨起来了呢?主要原因:第一,经过中央和各地区大张旗鼓地反冒进和普遍号召走合作化道路的宣传,很多干部和农民看到了合作化是唯一道路,迟走不如早走。第二,有的合作社办得好,增了产,群众看到了合作社的好处,故而积极要求入社。第三,各地区各级领导都害怕戴“右倾保守”的帽子相互攀比,谁也不愿在办社数字上落后,因而都尽力加快本地区的合作化步伐,注意总结和宣传所辖地区农民积极性的典型事迹,而很多材料又带有不同程度的水分。这些情况表明,党内相当多数的同志当时对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过分地迁就部分农民对党具有的朴素感情,并把这种感情同生产力发展规律混淆起来,过低地估计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长期性,党内不少人在成绩面前不够冷静,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由于只看表象,不看本质,只看成绩,忽视存在问题,故而把农村的形势看得完美无缺,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了不应有的夸大。形势与政策是互为因果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发展进程。应该说一、三两条原因反映了党内当时的一种工作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和盲目乐观情绪,某些干部中已开始显露“宁左勿右”的苗头。在这种思想倾向的驱使下,当然就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看得不够,对农民的觉悟估计过高,实际工作中急于求成。

四、从作风上看,“上有好之,下必盛焉”开始在党内冒头

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颁发的文件和有关材料来看,在1955年7月以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直是稳步发展,尽管其间出现过两次冒进,但在实际工作中都被较好地纠正了。可是,自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立即掀起了一个高潮,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检讨前一阶段办社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坚决收缩”的“右”倾错误,重新修订原来关于合作化的计划。一致认为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正在到来,要保护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年10月11日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只有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改变领导落后在群众运动后头的局面。这个转变是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前进的取得完全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1](第449、450页)。这次会议和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全国农业十年发展纲要都将完成农业合作化的时间大为提前。

各省、市、自治区党的负责人听完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立即动身返回本地区,连夜传达讲话内容。从8月份开始,各地纷纷给中央上书报告,表示一致完全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指示“千真万确”。原先合作化运动中问题较多的浙江省,给中央的报告检讨最深刻,认为1955年春收缩合作社是“胜利吓昏了头脑”,表示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以“积极而又严肃的精神来接受教训”,重新研究制定农业合作化发展和巩固的计划。从8月上旬到9月上旬一个月之内各省向中央表态,到“一五计划”期末,保证本省入社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2/3左右。这比毛泽东同志在7月31日讲话中设想的全国半数农村人口在1957年底入社的计划大大超前了。毛泽东同志在讲话

中不仅批评了“胜利吓昏了头脑”，而且还批评了“胜利冲昏了头脑”也不好，强调“注意合作化的质量，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合作社和农户数目字的那一种偏向。”可是，这时大多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及其下属均不大顾及“左”的偏向，惟恐落在其它地区的后头，惟恐“领导落在群众的后头”，争先恐后地发展初级社和创办高级社，形成一股大哄大嗡的风气，此种风气一长，使动作慢一些、合作化基础差一些的省、市、自治区也不得不奋起直追。这就使本来已经过快的合作化运动，更加高速发展，其结果是比原来已经超前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计划更加超前了。省、市、自治区闻风而动“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行动，既反映了大家雷厉风行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党当时已开始滋长大哄大嗡的风气。这种“一哄而上”的风气，后来发展成为“跟风”、“看上级脸色”、“见风使舵”，为 1958 年的“大跃进”和庐山会议后期的“反右倾”埋下了种因。可见，党内“上有好之，下必盛焉”的不正之风发端于此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急躁冒进与党在作风上出毛病是有联系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合作化后期的急躁冒进，非一时的冲动，既有其历史原因，也有观察形势分析问题上的失误，也有党的作风方面的不纯；根子在于偏离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当时所处的地位和他在全党的威望，他的言行、态度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也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还重犯急躁冒进的错误，最根本的症结在于对以往的失误从根源上挖掘得不深不透，尤其是思想上、作风上的问题很少反省、很少检查，或者一碰就恼，一碰就跳。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合作化后期这一段历史，重新探索“急躁冒进”的深层原因，对于人们理性地认识国情，自觉地树立“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思想作风是有裨益的，同时这个时期的历史也给我们以教益：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独立思考、坚持真理，更不要将独立思考、坚持真理与服从领导、服从组织对立起来。

注 释：

①②③④⑤ 分别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1979 年 4 月刊印，内部发行）第 187、272、283、284、291 页。

[参 考 文 献]

-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 [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 [2]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 [Z]．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 [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叶娟丽）

Reasons of Impetuosity in the Late Period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CHEN Guo-qing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HEN Guo-qing (1951-),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reasons of impetuosity for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late period. The impetuosity is not that Party's leaders excite suddenly but that contradiction between developing industry and backward agriculture is outstanding, And it is inevitability of solving it. One-sidedness of theory and impropriety in viewing situation and boast of local leaders and so forth. These are all reasons of impropriety at that time They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 about "demand is too hurried, work is too rough, change is too fast, form is too simple, leave behind some problems for long term."

Key words: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mpetuosity; fundamental illness